

满腔愤怒的控诉 满怀深切的同情

——评雨果和他的优秀短篇小说《克洛德·格》

江 伙 生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在法国巴黎东北部的特鲁瓦布,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城的事件:一个穷苦的工人变成了一个杀人犯,然而在刑事法庭上,他却成了众人惊叹的演说家。他站在被告席上,眼光明亮,诚实坚定,他勇敢地面对着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关于预谋杀人的条款,不怕这条法律可能会砍掉自己脑袋的危险,陈述一切,证实一切。他高声质问:你们说我偷过东西,说我杀过人。“但是我为什么要偷窃?我为什么要杀人?陪审员先生们,请你们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吧。”

这个犯人,就是维克多·雨果的著名短篇小说《克洛德·格》中的主人公克洛德·格。作者在描写这个人物时,笔端饱含着感情,读者在了解他不幸遭遇的过程中,眼眶里充满了泪水。雨果的思想和读者的感情能达到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是十分不易的,作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是法国文学史上伟大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是十九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导师。

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雨果出生在贝桑松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但他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由于母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少年的雨果是保皇党人的一个同情者。但是一八二四年查理十世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和变本加厉的反动从反面教育了作者,一八三〇年爆发的七月人民革命象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指引着诗人前进的道路。当他看到他过去所拥护的东西是腐朽和丑恶的,必然被历史所抛弃时,他便和伪古典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和保皇主义由疏远到彻底决裂,站到进步方面来。他

的《致年青的法兰西》的诗篇是献给革命参加者的颂歌,他的《赞美诗》是怀念那些牺牲者的悲壮的悼词。在革命前夕经过激烈斗争以后才得以上演的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欧那尼》,是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巩固了雨果自一八二七年发表著名的文学论著《〈克伦威尔〉序》以后所确立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地位。那篇序言一直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的战斗宣言,正如戴奥菲勒·戈吉野^①在他的《浪漫主义史》一文中所说:“那真是奇妙的年代。《〈克伦威尔〉序》在我们眼里发出灿烂的光辉……它引起了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一八三一年,雨果的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问世。假托于小说中的是十五世纪发生在巴黎的一系列的事件,但作者抨击的却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歌颂的是贫寒劳动者正直、善良和真诚的品质。小说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强烈的戏剧性和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随后作者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浪漫主义剧本《道遥王》(1832)、《吕克莱斯·波基亚》(1832)、《玛丽·都铎》(1833)、《安日洛》(1835)、《吕意·布拉斯》(1838);诗集《秋叶集》(1831)、《微明之歌》(1835)、《心声集》(1837)和《光与影》(1840)。这些诗、剧有的鞭笞封建暴君,有的揭露社会的各种恶习,有的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虽然个别诗篇寻觅的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描写的是家庭的天伦之乐,但诗、剧的总的倾向是积极向上的,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强烈地震撼着作家的心灵。他虽然认为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自己本身”,但又觉得他们是在“呼吁自己的权利”。一八四八年底,雨果曾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台当共和国总统,而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当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时,雨果又加入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结果失败,遭到拿破仑三世的血腥

镇压，雨果也未能幸免，被迫流亡国外达十九年之久。

流亡期间，作家满怀悲愤的心情，出版了《拿破仑》的政治小册子，写成了《一桩罪恶史》（1877年才发表），特别在一八五三年发表了不朽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把窃国殃民的拿破仑第三及其集团揭露得体无完肤，讽刺得淋漓尽致。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雨果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以及稍后发表的《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悲惨世界》是统治阶级鱼肉人民的罪恶史，是穷苦百姓倍受欺凌的苦难史；《海上劳工》是诺曼底省渔民对大自然进行顽强斗争的一曲颂歌；而《笑面人》则是英国贵族统治集团腐朽、淫乱、“比狼更像狼”的丑恶嘴脸的真实写照。

一八七〇年，拿破仑第三小王朝复没，雨果回到了祖国。普法战争暴发以后，特别是当普鲁士军侵入法国本土时，诗人上下呼吁，到处演说，号召人民奔赴国难，保卫祖国。他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并把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稿酬捐献出来，铸造两尊抗战的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

巴黎公社起义时，他先未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曾一度持反对的态度。但当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他又极为愤慨，严厉谴责反动派的暴行，要求全部赦免公社社员，并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公社社员的避难所。他自己险遭歹徒的暗害，并因此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

一八七二年他的诗集《凶年集》出版，讨伐了侵略者的暴行，寄托了对牺牲了的公社社员的无限哀思。一八七四年发表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作家以这个醒目的标题，描述了一七九三年资产阶级革命中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封建贵族的卷土重来和垂死挣扎，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革命气氛，共和军官兵的不屈不挠和英勇献身的精神，都被描写得绘声绘色。但作家在处理共和军年轻有为的指挥官郭文和反革命头目朗德纳克的关系中，从“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让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结果郭文自己受到了军法的制裁，被判处了死刑。正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在执行枪决时放走了一直在跟踪迫害他的警探沙威一样，作者的那种浅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而又成为了作品的一个多么严重的缺陷。

一八八三年，雨果的最后一本诗集《历代传说》出版了。这个诗集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有才华的、诗情并茂的抒情史诗之一。

在诗人的世界观中虽曾充满着矛盾，在某些重大事件面前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在关键时刻，他却总是站在进步人类一边的，这正体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成长过程。雨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而且也充满了对人类的关心和同情。他曾多次发表演说和声明，谴责英国压迫爱尔兰，俄罗斯侵略波兰，英法联军进攻中国。他说他们一个是“装满了自己的口袋”，另一个是“装满了自己箱子”的“两个强盗”。

一八八五年，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百万民众为他举行国葬，巴黎公社的老战士也脱帽向诗人致哀。正如当时的许多报刊杂志所说，雨果没有死，他和他那数量丰富，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语言动人的诗文一样，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二

《克洛德·格》写于一八三四年，内容取材于真人真事。说的是巴黎的一个穷苦的工人克洛德·格天资聪明、灵巧、能干；他不识字，但善于思考，长于表达。他无钱娶亲，只能和一个被人称为“妓女”的年轻女人生活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有一年冬天，他走遍全城，也找不到工作。为了不使女人和孩子冻死饿死，他去偷窃了。偷窃的结果只给女人和孩子带来了三天的面包和取暖的柴火，而给男人带来的却是五年的监禁。克洛德·格下狱时才三十六岁，可是“有时看起来倒象有五十岁。”苦难的生活竟是这样的无情。在监狱中，克洛德·格的真诚、直爽和才干赢得了周围人的钦佩，但为当局所不容。他结识了天真纯洁、年仅二十但被社会逼迫走上了邪路的小偷阿尔班，他们“在同一间屋子里睡觉，在同一个院里散步，分吃同一块面包。”在生活迫使他的女人沦为妓女，孩子不幸夭折以后，克洛德·格视阿尔班为自己唯一的亲人。他们两个好朋友，每个人对于对方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可是生活不容他们，社会不容他们，典狱长狄先生硬要把他们拆开，不仅把阿尔班私自调走，不许他们见面，而且当克洛德·格多次求情希望把阿尔班调回时，狄先生还关了他二十四小时的禁闭。在遭受到多方面的迫害以后，克洛德·格忍无可忍，当众杀死了典狱长狄先生，结果他自己也被送上了

断头台。

虽然雨果文学创作中的主要成就在于长篇小说,直抒胸怀的诗歌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纲领《〈克伦威尔〉序》等方面,但在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的《克洛德·格》却是永远紧扣读者心弦的优秀之作。克洛德·格是个普通的穷苦工人,就因为穷苦,他便任人宰割,为几块面包成为了偷窃犯,以致最后被杀了头。他的天资是那样的聪慧,手是那样的灵巧,头脑是那样的敏锐,然而在如此广阔的人地上却无他的出路;他对朋友是那样的忠实,对自由是那样的渴望,对正义是那样的酷爱,但在标榜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里却无他的立足之地。难怪他在临刑前要向旧世界高喊:“至少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被判处了死刑?”这正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人公、吉卜赛女郎艾斯梅那得在绝望中向人类质问的一样:“全世界都有白昼,为什么人家只给我黑夜呢?”这是被压迫阶级愤懑不平的呼声,是作者通过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对那个倾斜不平的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

《克洛德·格》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典狱长狄先生。“他刻薄无情,专横残暴,刚愎自用,盛气凌人。”他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卒,是宪警机关的无耻鹰犬。谁不对他的劲,他就加害于谁,甚至无缘无故也要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进行迫害。阿尔班和克洛德在一起,那种“友谊与其说是手足之情,还不如说是父子之爱更恰当些,”他们已经到了相依为命的程度了。但是狄先生硬要把他们拆开。当法官在法庭上说并无人向克洛德挑衅而他杀死了典狱长时,克洛德控诉说:“没人向我挑衅过?”“这四年中,他侮辱我,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他都用针在料想不到的地方扎我。我曾经有过一个女人,为了她我偷了东西,他就用这个女人来折磨我;我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为了孩子我偷了东西,他就用这个孩子来折磨我;我吃不饱,一个朋友给我面包,他夺走了我的朋友和面包。”克洛德忍受的是一种比肉体还要厉害十倍的精神上的挑衅。狄先生“是一个恶毒的家伙,是一个虐待狂”,他死有余辜。

小说中还写到一群“偷窃犯”。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们不是犯人,而是生活的主人。但是生活却把他们变成了奴隶,世界竟是这样的不平。他们心地纯洁美好,为人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克洛德告诉他们,说他几天以来一直在心中审判一个人,并判处了他的死刑。当他们得知这个人就是作恶多端的

狄先生时,“既没有人来劝克洛德,也不会有人去告发他。”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可怕的,但又是公正的,明白的,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在细木工场里有二十七名犯人,当克洛德向他们借斧子时,他们明知道他是准备用斧子去处决狄先生的,不仅无人劝阻,反而拿出好几把斧子让他挑选。克洛德·格并没有叮嘱他们保守秘密,可是大家却守口如瓶。他们身上承受着同一个重压,生活中饱尝着同样的苦水,心中有着同一个敌人。作者以他们的生活遭遇满腔愤怒地控诉了那个“贫苦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②”的社会。这正如在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里,纯朴的穷工人变成了苦役犯,美丽的穷姑娘沦为娼妓,才会学走的孩童竟要承担起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佣人的杂役。“看看这架天平吧!富人的盘子里全是享乐,穷人的盘子里全是苦难。”字里行间,声声句句,寄寓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悲惨世界》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克洛德·格》却是一张惨淡的人生素描。虽然前者洋洋万言,后者字仅数千,但它们却成为《哀史》③的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三

“恶与善相共,阴影与光明并存。”④雨果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强烈的对比来刻画人物,反映现实,揭示主题。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把形体上畸形得最可厌、最可怕、最完全,但心灵上最纯洁、感情最高尚的司钟人加西莫多与外表威严、道貌岸然、形体美好,但内心淫欲横溢、手段凶恶残忍的副主教克洛德·孚罗诺摆在一起,美与丑是那样的矛盾,但内容和实质又是那样的统一。小说反映了作家对教会虚伪本质的抨击,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在《悲惨世界》里,作者让米里哀主教与沙威警探并存,前者代表仁慈和宽恕,后者代表凶残和暴力;作者把冉·阿让和德纳第摆在一起,前者体现正直、仁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后者代表贪婪、邪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恶习。在《九三年》中,作者让共和国联军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头目朗德纳克三个鲜明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照,通过他们生活中的前因后果,把作者本人的爱情、理想和世界观中的矛盾及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两重性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克洛德·格》中,雨

果让他的主人公充分个性化。作者不致力于细节的描写，而着笔于理想和激情的表达。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克洛德多次向狄先生要求把好朋友阿尔班归还给他，是为了分享那半块面包？不！若是这样，那为什么当其它囚友主动送给他面包时，他都婉言谢绝了呢？他杀死狄先生是为了报一己之仇吗？更不是。他与狄先生之间并无个人的恩怨。作者在这里要揭示的主题是：正义和自由是多么的重要，忘我献身的精神是多么值得赞美！克洛德·格的刚毅不阿、正直善良与狄先生的“专横残暴，刚愎自用”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他光明磊落的品质，坦荡无私的胸怀与他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鬼域横行是多么地格格不入。作者的爱憎跃然纸上，读者的感情起伏跌宕。

政论性是《克洛德·格》在艺术风格上的另一特点。雨果总试图把自己的作品变为社会的讲坛，亲自出来讲话，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他说：“看看克洛德吧。毫无疑问，他头脑聪明，心地纯正。但是命运把他置于如此糟糕的一个社会里，他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社会又把他抛入如此糟糕的一个监狱里，他最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谁是真正的罪犯？是他？还是我们？”作者直言不讳地说：“人民在挨饿，人民在受冻。苦难迫使他们走上邪路，男人们犯罪，女人们堕落。……说明社会这个组织的血液里患了病。”这便是结论。我们是在读着一部小说，又好象是在品味着一篇政治性的论文。卷已离手，但感情的潮水却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有些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说雨果是“法兰西第一号的恶意煽动者”，说他的诗文是“魔鬼所作”。雨果认为这正是他的光

荣，他情愿他的诗文“在政治风暴中冒险，正因为如此，它才更美、更强有力。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来感受诗歌的时候，我们情愿它居于山巅和废墟之上，翱翔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而不愿它向永恒的春天逃避。我情愿它是雄鹰而不是燕子。”⑤《克洛德·格》的政论性和现实性是作者这一宣言的最好的注脚。

虽然雨果并不那么赞成暴力行为，但他却认为克洛德杀死狄先生是“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虽然他认为只要“在穷人的命运里，在苦难的盘子里，加进美好的前途，加进对于永恒的幸福向往，加进天堂”，就能够使极端倾斜的资本主义社会“重新恢复平衡”，表现了他的乌托邦式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他毕竟勇敢地说出了下层劳动者的心里话：“对于那些在工作和受苦的人民来说，这个世界是不好的。”他大声地向社会疾呼：“想想人民的大多数吧。”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于那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满腔愤怒的控诉，对于那些被侮辱被蹂躏的下层劳动人民寄予了满怀深切的同情，这永远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后人所决不会忘却的。

注释：

- ① 戴奥菲勒·戈吉野(1811—1870)，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
- ② 雨果：《〈悲惨世界〉序》。
- ③ 《悲惨世界》的最初中译本译为《哀史》。
- ④ 雨果：《〈克伦威尔〉序》。
- ⑤ 雨果：《〈秋叶集〉序》。